

1949—1979

儿童文学

诗 选

上

袁 鹰 邵燕祥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中国大学出版

诗选

中国大学出版

中国大学出版

儿童文学

诗 选

上

袁 鹰 邵燕祥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题字：茅 盾

封面设计：陈 达 林

儿童文学 诗 选(共二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59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9 插页 4

197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79 年 1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书号 10019·2738

定价 2.20 元

序 言

袁 鹰

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建国三十年的儿童诗选集。

一九四九年同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婴儿，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十周岁了。不仅早已度过了儿童和少年时代，而且也超过了共青团员的年龄。三十年来，他们同共和国一起成长，同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同迈步，度过旭日东升的春晨，度过冷雨潇潇的秋夜，经历了万木凋零的严冬，又重新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新春。同样，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包括儿童诗在内，也都经历了一番阴晴圆缺、艰辛喜乐的过程，度过了既有崎岖、也有坦道的三十年。

今天，正当祖国大地又沐浴着万里春光的日子，我们着手编这本三十年儿童诗选集，有机会重新阅读三十年来的大量儿童诗歌作品，心头经常涌起一阵阵难以名状的感情：有喜悦，有兴奋，有愤怒，也有哀思。

从一滴水能看到大海，从一本儿童诗选也能反映祖国历史浪涛汹涌的历程。

在这本选集的卷首，先向同志们介绍几位革命老前辈写的儿童诗。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人民革命事业南征

北战几十年，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他们在国事繁忙之中，仍然热切地关怀和期待接班人的成长。董老在《书赠小学生》中对新一代寄予那么殷切的期望；陈毅同志在《儿童篇》里，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概，谆谆地引导儿童开阔眼界，去关心国家大事、放眼世界风云；郭老的《新中国的儿童》，曾经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歌词而为亿万少年儿童所熟悉的。今天的许多成年人，许多青年，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每当唱起队歌，就温习一次自己肩头的重任和面前的远大理想。

这组诗的作者，都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们为儿童写的诗，是这本三十年儿童诗选集的瑰宝；而他们那种共产主义战士“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更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典范。

三十年来，儿童诗的创作，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一样，一直是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健康地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里，它同样是五彩缤纷的一角。这本选集，也许可以让我们从一角看到繁花竞放、万紫千红的旺盛景象。

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到文化大革命的十七年间，许多专业和业余的诗人，为我们的下一代创作了大量的儿童诗，许多报刊、出版社，也发表和出版了为数不少的儿童诗集（这本选集，就是在过去好几本选集的基础上编选的），在中小学校、少年宫、少年之家，在夏令营、篝火晚会和其他形式的集会上，孩子们自己写、自己朗诵的诗，更是不计其数。我们在这里只是从万顷碧波中

舀起一勺水，从繁茂花坛上采撷几朵鲜花。而且，限于我们的思想、艺术水平，也限于我们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挂一漏万固然是肯定的，忽略了许多佳作也很有可能。但即使仅仅从这二百多首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约略地看到伟大祖国波澜壮阔、多姿多采的风貌，听到八亿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步前进的脚步声。新中国的儿童诗作者，从一开始就遵循毛主席指出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方向，自觉地担当起教育下一代的神圣职责，努力使自己的笔同伟大的时代紧密结合起来。在成千上万首儿童诗里，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车轮的每一声隆隆巨响，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每一次剧烈搏斗，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欢乐和苦难，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呻吟、希望和反抗，都能在儿童诗作者的笔下得到反映——即使是侧面的反映。而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儿童诗歌最突出的成就。儿童诗有自己的特殊功能，儿童诗的创作，当然也有自己的特殊艺术规律，但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共同任务，表现时代精神，表达人民意志，肩负革命使命，在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歌也是决不例外的。

过去，曾经有同志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特点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否认社会主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似乎在儿童诗里不能提阶级性、政治性和思想性，认为那样就要损害儿童的心灵。三十年来的实践已经多次证明：那样做，等于阉割了儿童文学、儿童诗歌的灵魂。失去了灵魂，即使有着美丽诱人的躯壳，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三十年来我们的儿童诗歌，从总体说来，是坚

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的，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特性的。它的主流是正确的。这本选集中占相当大篇幅的优秀作品，就完全足以证明儿童诗歌的可喜成就，如果用绚丽的花朵来作比拟，我以为并不过分。

然而，儿童诗歌毕竟不是为成年读者写的，它的对象是少年儿童——从托儿所的小娃娃直到摘下红领巾的共青团员。这就决定了它的内容和形式、体裁和语言、构思和情趣，都需要按照自己对象年龄的特点来寻找独特的表现方法。过去，也曾经有同志不承认这一点，认为注意了儿童年龄特点就是“儿童中心论”，就是资产阶级的“童心论”，这是不应该有的误解。而这种随意贴标签的简单化做法，也曾经给儿童诗带来一些理论上的混乱，在创作实践上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儿童诗的特点，不仅应该允许存在，而且还要大大提倡，大大发扬。没有个性，也就无从体现共性。就象高尔基说过的：“想写儿童文学的作家应该估计到读者年龄的一切特征。否则，他写的书会成为儿童和成年人都不需要的无着落的东西。”

儿童诗同样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样要注意和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儿童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儿童生活，尤其是丰富多彩的。在这本选集里，我们可以从许多儿童诗中看到他们活跃欢快的各个生活面，诗人们把我们引进一个十分广阔而又充满生机的天地，使我们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在这本选集里，我们也可以读到各种体裁的儿童诗：抒情诗、叙事诗、童话

诗、寓言诗、讽刺诗、风景诗、科学诗、童谣、朗诵诗和各种歌词。还有些作者写了不少科学诗，它们收在另一本选集中了。在风格上，有的奔放，象一泻千里的江河；有的委婉，象曲折迂回的溪涧；有的气势雄壮，有的意境清新；有的明快，有的含蓄；有少先队员激越的胸怀，也有学龄前儿童的天真的情趣。同样是儿歌，有儿童现实生活的描述，有神奇美妙的幻想，有祖国山川的壮丽画面，也有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的千姿百态。而所有这一切，小读者们都是需要的。我们的少年儿童很喜爱诗歌，在他们日常生活里，几乎处处都需要诗：学习的时候需要诗，集会的时候需要诗，课外活动中需要诗，营火晚会上需要诗，登山行军中需要诗，做游戏的时候需要诗，就是小弟弟小妹妹睡觉，也还需要妈妈和奶奶唱“催眠曲”。思想深邃、文字优美的儿童诗，可以帮助少年儿童培养崇高的思想情操和道德观念、增加社会和自然知识，也还可以向孩子们进行美感教育。

儿童诗有无限广阔的天地。在这个天地中，许多先行者披荆斩棘，为我们探索了道路。五四运动的文化先锋们，打倒了孔家店，宣判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类的《神童诗》的死刑，用清健的、明白如话的白话诗，将少年儿童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儿童诗同儿童生活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许多诗人在新儿童诗歌的创作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让儿童诗歌逐渐同翻天覆地的时代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让儿童诗有了新的生命。建国以来三十年的儿童诗，正是吸收了前人的经验，继承了优秀的传统，不断前进的。

近十多年来，风云突变，冰雪横飞，儿童诗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林彪、“四人帮”那伙阴谋家、野心家，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首先挥舞起“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屠刀，在文艺界大肆砍伐，搞得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儿童文学自然也不能幸免。他们对儿童文学一窍不通，但是，“黑线”、“封资修”、“牛鬼蛇神”这些吓人的大帽子照样满天飞。写母亲爱子女、老师爱学生，是“人性论”；写儿童的转变和成长，是“中间人物论”；写儿童的生活情趣，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写禽兽虫鱼，也成了“大毒草”……横扫狂杀一阵之后，还剩下什么呢？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包括儿童诗），都被一棍子打死了；图书馆里，许多孩子喜爱看的童话、寓言、诗歌、故事，都被严密地封存起来，或者零乱地散失了。整整十年中，新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寥寥可数，好的更象晨星。如果说文艺界是林彪、“四人帮”残酷破坏的重灾区，儿童文学也可以说是重灾区里的重灾户，至少是重灾户之一吧。

叛徒江青的黑手，也象毒蛇一样伸进儿童诗的园地。北京一所小学里孩子们写了几首儿歌，被这个凶残狠毒的阴谋家看到了，心怀鬼胎地一把抓去，大做文章，封为“革命儿歌”的“样板”，妄想用儿童诗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一时之间，“批批批，斗斗斗，打打打”、“×××，大坏蛋，不把他打倒心不甘”这一类“儿歌”，几乎泛滥成灾。有人说，那时候的儿童诗是“数量大，质量差，千篇一律干巴巴”。为了适应这种畸形发展的需要，居然也出现“常用儿

歌三十句”，“常用儿歌二百句”之类的玩意。儿童诗到了这地步，就算被他们糟踏得不成样子了。

那些年，也有不少作者和老师抵制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他们竭力鼓吹的那一套，怀着要为下一代提供些精神食粮的衷心愿望，写了许多儿童诗。他们坚持从生活出发，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因而在一些报纸刊物上，依然能读到些好的儿童诗，虽说它们毕竟太少，但总是在一片浑浊的空气中散发了芬芳的气息。至于那种帮腔帮味十足的儿童诗，在小读者中并没有真正的市场。但是，对这一类“儿童诗”，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_小读者并不喜欢，并不承认，就低估了它们的流毒。它们不仅伤了小读者的胃口，毒害了孩子们的思想，败坏了儿歌的名誉，更在儿童诗的创作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为什么不少儿童诗用政治概念代替艺术形象？为什么那种空洞无物、装腔作势的儿歌，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也时有发现？追根溯源，不能不说是受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流毒，特别是那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冒牌儿歌的影响。

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的极左路线，从根本上颠倒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肃清他们的流毒，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首先就要回到从生活出发、从实际出发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去。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从来就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也是儿童诗歌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毫无疑义的。过去也有同志认为写儿童诗很容易，不需要什么生活，或者认为自己的一点生活基础，已经绰绰有余，只要写得浅近些，用点儿童语言，就是儿童诗了。这都是很大的误解。到了林彪、“四人帮”霸占文坛的时期，

种种谬论发展得更加登峰造极。儿童诗，同样需要深入生活，从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生活和斗争海洋中汲取诗情、塑造艺术形象。反映儿童现实生活的儿童诗，还应该有自己的要求：一要来自儿童的生活，二要来自中国儿童的生活，三要来自社会主义中国儿童的生活。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深刻地而不是浮浅地写出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思想愿望和喜怒哀乐；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写出一首好的儿童诗。

优秀的儿童诗来自人民群众斗争的海洋，这从《天安门诗抄》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本诗集中有一组光华四射的诗篇，那就是从《天安门诗抄》中选来的五首诗。这五首诗，虽然不是专门为少年儿童写作的，却是便于广大少年儿童接受和为他们所热爱传诵的，它们从特定的角度留下了伟大的四五运动的斗争风貌。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几百万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上，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讨伐反党阴谋家的斗争，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运动。革命的人民，在如山的花圈和如海的诗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尽哀思；也用花圈和诗词作武器，对万恶的“四人帮”进行公开的、声势浩大的声讨。天安门广场上成千首诗歌，是反映这场伟大运动的辉煌史诗，也是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也有儿童诗。例如：

蚍蜉撼大树，

摇又摇：

“我的力量大，
知道不知道？”

大树说：

“我知道，
一张报，
两个校，
几个小丑嗷嗷叫。”

多么犀利的解剖，多么有力的鞭挞，又是多么富有风趣的嘲笑。它是一首真正的革命儿歌。这组诗歌的作者，同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所有革命诗文的无名作者一样，并无心作诗人，更不是作为准备发表和出版的儿童诗来写的。他们是在向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进行讨伐和冲击。儿童诗、儿歌、童谣，在战斗者手中，同样也是一柄匕首、一颗炸弹。唯其如此，这几首来自战斗第一线的诗，才那样铿锵有力，光彩夺目，激动人心。它们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教育了少年儿童，也预告了“四人帮”的覆灭。

我们所有儿童诗作者感到无比兴奋的，是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我们八亿人民，也为我们的下一代，清除了祸国殃民、罪恶滔天的蠹贼，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大业。我们的文学艺术从“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儿童文学也如同经受了冰霜凌压的苗芽，重又得到阳光雨露的滋养，迅速地呈现出蓬勃的

生机。

选集中近两年来的部分，尽管数量并不占太大比例，但是它们向我们初步展现了儿童诗歌新的潮头、新的面貌和新的特点。许多儿童诗作者在他们的诗篇里，深情地表达了亿万少年儿童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革命老前辈们的衷心爱戴和无限怀念，表达了孩子们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万恶的“四人帮”的无比欢欣。在那些诗句里，我们听到了孩子们激荡跳跃的心声。《我的爷爷》那样深情而细致地描述了一位老红军战士怎样同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进行斗争，它控诉林彪、“四人帮”残害老一辈革命战士的罪行，使人声泪俱下；它描写老战士不屈不挠的斗争，又使人神采飞扬。《风筝》、《天上的歌》和别的几首诗，含着热泪倾诉了广大少年儿童和台湾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和热爱。它们是发自肺腑的歌声，所以才那么重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只有粉碎万恶的“四人帮”，才会出现这样动人的好诗。

打倒了“四人帮”，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大步前进。我们的儿童诗，也象整个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创作一样，出现了崭新的主题。诗人们为我们的小读者描绘了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神奇美妙的宏图，介绍了一些向四个现代化高峰攀登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飞吧，飞向二十一世纪》、《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陈景润叔叔的来信》、《困难这么说》、《不知道和小问号》这些诗，唤起小读者们勤奋学习、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愿望和幻想。“四人帮”好比童话里的狼外婆，满嘴花言巧语，把天真的孩子骗进陷阱，陷阱上面有几个黑字，文盲加流氓。有不少孩子已经跌进这可怕的陷

阱里去了，有不少正走到边沿上。我们的责任，就是用笔当武器，从“四人帮”的毒害中将少年儿童解救出来。诗歌，也就是这样一种犀利的武器。我们也跟小读者们一样，多么热切地盼望着儿童诗作者能为孩子们写出更多反映四化、歌唱四化的诗篇，在新长征路上给少年儿童吹吹号角、擂擂战鼓啊！

时代向我们儿童诗的作者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好长时期以来，儿童文学被人视为“小儿科”。儿童诗，似乎是小儿科中的小儿科。这种说法，很有些蔑视和嘲讽的味道。既是“小儿科”，当然不甚高明，这是一；第二，既是“小儿科”，也就人人可以干；还有第三，“小儿科”作品，免不了都是成人文学作品的“下脚料”。

这自然是大错特错的。那些把儿童文学看作“小儿科”的人，看来可能忘却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无论是他自己的儿童时代，无论是作为孩子的父母，他肯定不止一次去求助于小儿科大夫的。当他被父母带到小儿科大夫面前，或是抱着孩子来到医院里，他那热切、急迫和虔诚的心情，一定把面前这位小儿科大夫，看作是这世界上最可亲、最值得尊敬的人了。我们这样说，想来不会引起误会，以为是在嘲笑寻找小儿科大夫的病孩家长。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要说的只是：既然你在实际生活中懂得小儿科大夫的重要，一天也不可缺少，为什么又要以那么不严肃、不尊重的口吻来谈到儿童文学和儿童诗这个“小儿科”呢？

在少年儿童占两亿人口的中国，怎能没有大量的小儿科大夫？同样，在读者占两亿人口的中国，又怎能没有大

量的儿童文学和儿童诗作者？我们既要为“小儿科”辩冤，为“小儿科大夫”高唱赞歌，更要积极地培养、发展一支日益壮大的儿童诗作者队伍！

我们儿童诗的作者，又多又少。多，是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愿意为孩子们写诗，他们也确实写了许多为小读者喜爱、并且长久不忘的好诗。建国以来，出版过不少儿童诗集和选集，每一本里都有不少知名诗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在这本三十年儿童诗选中，我们同样看到为许多大读者和小读者们熟悉的名字。少，是比较专门写儿童诗的作者，毕竟也还是寥寥可数。讲绝对数字，说不定也可以上百，但同两亿这个数目相比，那就显得太少太少了。我们多么盼望出现这样的景象：举国上下，大家都来关心新的一代的成长，大家都来向小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包括更多更好的儿童诗），从党政领导部门到社会的各条战线，到广大专业、业余作者，广大的教师、编辑、少年儿童工作者，都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茁壮成长，群策群力，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发行，辅导等各个方面，订出规划，拟定措施，一声令下，积极行动，这不正是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路上十分喜人的春色吗？北方农民有句俗话：“发不发，看娃娃。”下一代的健壮成长，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儿童诗作者在这方面多流一点汗水，多添几茎白发，也是值得的，也是心甘情愿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

目 次

序言	袁 鹰 (1)
书赠小学生	董必武 (1)
儿童篇	陈 毅 (2)
新中国的儿童	郭沫若 (8)
孩子们的衷心话	郭沫若 (10)
刘胡兰赞	郭沫若 (13)
红领巾的宣誓	郭沫若 (14)
少年先锋之歌	胡乔木 (16)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周郁辉 (18)
春姑娘	艾 青 (20)
向日葵	田 间 (24)
陈林和我	贺 宜 (26)
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	袁 鹰 (30)
毛主席开的甜水井	邵燕祥 (34)
我们快乐地歌唱	沙 鸥 (39)
红领巾之歌	叶 影 (41)
早操歌	管 桦 (43)
星星歌	徐 良 (45)